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90 周年专题

成长的远征:长征途中的巾帼力量

刘维芳[1,2],孙 文[2]
(1.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2.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2488)

摘 要:长征途中,数千名女红军承担着战勤保障、宣传动员与前线作战等任务:在战勤保障中,她们负责运输、医疗、筹粮等繁重工作;在宣传动员中,她们发挥独特的优势,宣传党的政策,赢得沿途群众的信任,鼓舞战士士气;在前线作战中,她们英勇杀敌、不怕牺牲。她们所展现的革命意志、战友情谊、乐观主义等精神品格,使自身在主体意识及独立人格、意志品质和心理韧性、组织能力和专业技能、集体主义及大局观念等方面都实现了跨越式的成长。这既是长征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生动注脚。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90 周年之际,重温长征途中女红军的成长历程,将为新时代女性把个人成长融入民族复兴伟大征程,提供宝贵的精神资源与榜样力量。

关键词:长征;女红军;巾帼力量;长征精神

作者简介:刘维芳,女,法学博士,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史和妇女史研究;孙文,女,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史和妇女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26)05-0012-11 **收稿日期**:2026-05-26
DOI:10.13763/j.cnki.jhebnu.psse.2026.05.007

2026 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90 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①对于参加长征的女红军来说,长征还是一次打破传统界限的远征、凝聚巾帼之力的远征、实现跨越式成长的远征。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女红军既承担着艰巨的战斗与行军任务,又要应对生理期、怀孕、分娩等特殊困难。②她们并非仅仅是苦难的承受者,而是凭借着其独特亲和力与沟通智慧,在筹粮、宣传中成为连接红军与群众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提到:“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③董必武曾赋诗赞誉长征中的女英雄:“四渡赤水若等闲,大渡天险亦心坦。夹金山上积雪奇,茫茫草原何足难。红军女英爽夙志,风卷神州红烂漫。古来旧观须推翻,巾帼敢顶半片天。”④这群最早接受中国共产党男女平等思想的女战士,用生命与意志证明了女性在革命中的伟大力量。她们既是当时妇女群众眼中的“花木兰”,也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巾帼典范。

*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工程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保障妇女人权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021MGCZD020)

①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2022 年版,第 162 页。

② 顾秀莲主编:《20 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卷,中国妇女出版社,2013 年版,第 360-362 页。

③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年版,第 151 页。

④ 刘德隆、刘瑀编:《新中国的先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先驱诗存(1903-1949)》,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 年版,第 242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关于长征中女红军群体的研究，目前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其一是书籍类，多表现为当事人的传记、回忆录、自述和有关长征的纪实作品，以及妇女通史中有关长征的段落。① 其二是论文类，包括一些当事人回忆文章②，对女红军在长征中的经历、所作贡献，以及其中所蕴含的精神品质等方面的论述③；也有对长征中不同部队、不同籍贯女红军的群像研究④，少量研究综述等⑤。少量学者对女红军在行军极限、妊娠生育以及性别互助等维度的生命体验进行了深度分析，再现了女红军在生死极限状态下，如何将独特情感联结与性别互助转化为超越生理限制的革命意志的生命体验，推动长征女性群体研究走向注重个体生存史的方法论范式跨越。⑥ 上述成果对笔者全面了解长征中女红军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和资料基础。但也存在一些可以进一步深化的研究领域。从现有研究来看，学界对女红军的经历、贡献、精神品质等方面研究较多，对女红军通过长征获得的自身成长，尤其是女红军在长征历程中获得的独立人格、意志品质、心理韧性及各方面能力的提升等研究较为缺乏。本文拟在借鉴学界已有研究基础上，从长征对女红军自我成长的视角进行探讨，以期进一步深化长征史及妇女史相关研究。

一、长征中女红军的群体构成

1934 年 9 月中旬，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被迫放弃中央根据地，准备实施战略转移。10 月中旬经共产国际同意，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 8.6 万余人开始长征。⑦ 随后，红二、四方面军也先后离开各自根据地开始长征。当时的情况据邓颖超描述：“前有敌军拦阻，后有敌兵追赶，头上常有飞机轰炸，脚下走的坎坷道路，还要通过天险要道，悬崖峭壁，崇山峻岭，雪山草地，日夜行军，忍

① 详见郭晨：《巾帼列传——红一方面军三十位长征女红军生平事迹》，农村读物出版社，1986 年版；曾志：《长征女战士》第 1、2 卷，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6、1987 年版；江西省妇女联合会编：《女英自述》，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苏平：《蔡畅传》，中国妇女出版社，1990 年版；李坚真：《李坚真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年版；李安葆、刘录开编著：《女红军长征记》，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 年版；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 年版；金凤：《邓颖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叶心瑜：《长征中的女战士》，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 年版；李小江主编：《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年版；肖云：《我的母亲：长征中最小的女红军》，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 年版；刘丽丽：《她们：三十二个女人的长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年版；叶心瑜：《红军长征轶事》，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常敬竹：《战地女杰——长征中的红军女战士》，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年版；桑金兰：《长征女红军谢飞》，长征出版社，2006 年版；顾秀莲主编：《20 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卷；虞大江主编：《吴仲廉：从红军战士到法院院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 年版；康克清：《康克清回忆录》，中国妇女出版社，2011 年版；杨·海伦：《选择革命——长征中的女红军战士》，朱晋平等译，罗敏校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 年版；王忱、江山：《中国女红军长征记》，华艺出版社，2012 年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巾帼红军忆长征》上、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 年版；王定国著，谢飞编选：《百岁红军百年路：百岁女红军王定国的人生传奇》，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 年版等。

② 邓颖超：《漫谈长征》，《新中国妇女》1950 年第 13 期；危秀英：《回忆长征路上的三十位女红军》，《福建党史月刊》2006 年第 3 期。

③ 详见王东：《论女红军在长征中的突出作用和贡献》，《中州学刊》2006 年第 5 期；范红霞：《女红军长征的深远影响和重要意义》，《中国妇运》2016 年第 10 期；倪婷：《长征女红军的特殊作用和贡献》，《中国妇运》2016 年第 10 期；王若涓、王友平：《从“长征巾帼”到“法治先驱”：长征女红军对新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贡献研究》，《党政研究》2025 年第 4 期；江小惠：《长征中女红军的革命精神与历史贡献论析》，《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6 期；周彩玲：《长征路上的女红军》，《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 年第 10 期。

④ 王资：《福建籍长征女战士》，《福建党史月刊》2006 年第 3 期；王友平：《长征中的川籍女红军述论》，《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19 年第 4 期。

⑤ 韩洪泉：《近十年来长征研究综述》，《党的文献》2016 年第 5 期；王含、周倩：《红军长征史研究的新进展》，《中国社会科学报》2026 年 6 月 23 日。

⑥ 详见郭海文：《女红军的旗帜——试论长征途中女红军的革命性及女性感受》，《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6 年第 6 期；郭海文：《性别视角下的女红军研究》，《唐都学刊》2011 年第 1 期；邵雍：《长征中的女红军》，《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4 期；张彦惠：《女性视角的长征女红军》，《党史文苑》（下半月）2016 年第 10 期；汤锐：《性别·民族与革命：女红军长征时期在四川筹粮活动的历史考察》，《社会科学论坛》2023 年第 1 期；郭斓：《主体自觉与形象重塑——论长征女红军的美好革命品质》，《长征学刊》2023 年第 4 期。

⑦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 153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饥忍渴,人疲马乏,而部队还要和敌人作战。”①在如此艰难情况下,20万长征健儿中仍有至少2千名女性②,她们分散在红一、二、四等方面军中。

红一方面军中的女红军是经过中央组织部严格筛选出来的中央及地方机关干部,她们除了继续从事机关工作外,还要承担照顾老弱干部、护理伤病同志的任务。开始长征前,中央组织部确定了选拔的具体条件,主要有:第一,政治上坚强,最好是共产党员;第二,具有独立开展工作的能力;第三,身体健康。③ 选拔的过程十分严苛,尤其是在身体健康方面。据邓六金回忆:“时任组织部长李维汉来通知说,我们这些女同志要上前线了。我们非常高兴,觉得自己要像真正的战士一样上前线了。但是上前线有三个条件:必须能行军,身体健康,能够负重15斤。另外还有一个条件:我们必须进行体检。”④除去部分必须要跟随中央长征的女干部及部分领导的夫人外,严格的体格检查从一百多人中筛选掉一大半身体难以支撑长途行军的女红军。因此,原定有32名女干部随军,实际出发却只有30人。⑤ 据蔡畅回忆有2名同志因故调回,实际出发30人。⑥ 然而,董必武在描述这30位中央女干部时提到:“卫生部检查了这部分做工作的女同志们的体格,认为不适合于远征条件的留下了五个人,那时候被留下的五个女同志是多么的不高兴啊(后来有两个仍跟随别部分到了陕甘,毫无问题)! 移到麻地(距卫生部原驻地六十里)整备行装时,有四个女同志‘打摆子’(江西称疟疾为摆子),也被留下了……真正随军出发的还不到三十个女子。”⑦在这30个女红军中,中央机关女干部占大多数,分别是蔡畅、邓颖超、李坚真、贺子珍、康克清、刘群先、刘英、钱希均、周越华、李伯钊、丘一(益)涵、金维映、吴仲廉、甘棠(原名甘世英)、危拱之、陈慧清、谢飞、廖似光、王泉媛、钟月林、谢小梅、肖月华、李建华、曾玉、杨厚珍。⑧ 各省选拔来的女干部分别是江西省委的危秀英、粤赣省委妇女部部长吴富莲、副部长李桂英(原名李桂洪)、干事刘彩香以及福建省委妇女部部长邓六金。她们之中年龄最大的是蔡畅,不过34岁,年龄最小的是钟月林,仅有19岁。⑨

上述这些女红军,除了蔡畅跟随总政治部行动,康克清、周越华跟随总司令部,刘英跟随中央直属纵队以外,其余女同志大多数都在中央纵队的干部休养连。干部休养连属于后勤部卫生队,董必武任党总支书记,侯政(男)任连长,李坚真任指导员,吴仲廉任秘书。⑩ 干部休养连是一个特殊的连队,抑或是不

① 邓颖超:《漫谈长征》,《新中国妇女》1950年第13期。

② 李安葆、刘录开编:《女红军长征记》,第8页。关于参加长征女红军人数,目前学界有不同看法:1.据记载,随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女红军战士共有30名,而红四方面军中女战士则多达数千人。有必要指出,由于历史和政治原因,红军三大主力即红一、二、四方面军中,参加红一、二方面军的女红军战士人数不多且都留下了姓名,而红四方面军中女兵最多却多半没有留下姓名。据《中国妇女运动史》(任芬主编)称,红四方面军女战士多达8000或10000人,也有的书上称有数千人,但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参见李小江主编:《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第53页;2.参加长征的四路红军主力中,都有一批不同寻常的“娘子军”:随同中央红军长征的女干部共30人,其中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24人。红二方面军的女战士约20余人,分散在部队各个单位,“除个别人外,都随部队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女战士约2500人左右。红25军的女战士人数最少,只有周东屏、戴觉敏等7名护士,人称“七仙女”。在约20万长征大军中女战士仅占两三千人,但她们经受了比男战士更多的苦难,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她们在长征中的作用是突出和巨大的。参见王东:《论女红军在长征中的突出作用和贡献》,《中州学刊》2006年第5期;3.在20万长征健儿中,女性红军的数量只占百分之一左右,规模并不大。参见邵雍:《长征中的女红军》,《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4.长征出发时女红军人数约为3062人,长征结束时女红军约为354人。参见谈思嘉、高晓林:《“她们”的长征 ———论长征中的女红军》,《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③ 星火燎原编辑部编:《星火燎原丛书之五》,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19页。

④ 杨·海伦:《选择革命——长征中的红军女战士》,朱晋平等译,罗敏校译,第175页。

⑤ 郭晨:《巾帼列传——红一方面军三十位长征女红军生平事迹》,第4页。

⑥ 星火燎原编辑部编:《星火燎原丛书之五》,第120页。

⑦ 《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页。

⑧ 顾秀莲主编:《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卷,第405页。

⑨ 星火燎原编辑部编:《星火燎原丛书之五》,第120页。

⑩ 《董必武传》编写组:《董必武传(1886-1975)》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75页;顾秀莲主编:《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卷,第360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像连队的连队,董必武描述为:“大约有一百多个男人和二十五个妇女,看上去远不像是军人。他(她)们是被编到干部休养连的,大都是老、弱、伤病员和妇女,其中还有小脚的,然而都是受人尊敬的‘老革命’。他们每人背着一袋够吃十天的干粮,一包衣服,一把刷子,一个笔记本。有的还有一条毯子,每个人的腰上还挂着一个搪瓷缸子。”①关于这支特殊连队的主要任务,在干部休养连工作的女红军钱希均提到:“这个连的主要任务是照顾老弱伤病人员,协助他们长途行军。因此,组织了庞大的担架队、药担队,沿途不断雇用一些民夫。长长的队伍,目标大,行动慢,人数多,但战斗力不强。”②

红二方面军、红二十五军中参加长征的女红军人数相对较少。③ 红二方面军的陈琮英提到:“红二军团的女战士非常少。”④红二方面军随军长征的女战士大概有20余人,她们没有单独编队,分散在部队的各个单位中,她们分别是:李贞、陈琮英、戚元德、周雪林、蹇先任、蹇先佛、陈罗英、马忆湘、曾洪林、胡越强、张四妹(张玉英)、张二妹、陈月英、伍秋姑、石芝、范庆芳、杜玉珍、秦金美、朱国英、张金莲、吴友香、张吉兰、杜永新、张士美等。她们中有干部、机要员、宣传队员、护理员、炊事员等。⑤ 例如,蹇先任在军队中担任过文化教员,李贞在战斗中从童养媳成长为女战士,蹇先佛作为李伯钊的挚友极其擅长画政治宣传画,陈琮英长期从事情报工作极少与外人接触等。⑥ 同时,参加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女战士最少,1934年11月他们离开大别山开始长征时,3000名战士中有7名女护士,被战士们称为“七仙女”,她们分别是:周东屏、戴觉敏、余国清、田喜兰、曾纪兰、张桂香、曹宗楷。⑦

红四方面军中的女战士最多,人数多达千余名。有文献记载:“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女战士人数最多,约有2500人左右。”⑧实际上,红四方面军中女红军的人数远远不止2000余人。《巴蜀巾帼壮歌红四方面军女战士革命斗争实录》中有更为详细的记载:“1935年春,跟随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参加长征的妇女约八千人。其中,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一团、二团二千余名;红四方面军妇女工兵营五百余名;总政剧团及三个分团(营的建制)女战士及各军宣传队女队员近千名;总医院及各军医院女战士千余名;省委妇女学校学员近五百名;其余为机关女干部、后勤女战士及少数红军干部家属。她们的年龄一般在十七八岁左右,最小的仅有八、九岁。”⑨无论红四方面军中女红军人数的真实数据如何,这些女红军人数众多且几乎承担了长征途中大部分相关工作的情况是属实的。据蹇先任回忆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的场景,便可证明这一点,她描述道:“我看到的女兵大都是从事政工、宣传或医护工作的。她们都是劳动妇女,大多数是四川人。一些女同志虽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却非常能干。那些做宣传工作的不仅会演讲还会唱歌、演戏,丰富了部队战士们的生活。当她们在战斗中遇到敌人时,表现得非常英勇。她们把伤员抬上担架,背着医药箱进行救治。她们挖战壕、运粮食。炊事班里,不分男女都背着个又大又沉的铜锅。”⑩与红一、二方面军不同的是,红四方面军中的妇女独立团是战斗编制,与男同志的战斗部队一样承担战斗任务。她们除参加战斗外,还承担打扫战场、收缴武器、修工事、运输物资、抬担架、照顾伤员等后勤工作。⑪ 她们在行军中是全副武装的,妇女独立团的成员杜文凯称:“长征

① 《董必武传》编写组:《董必武传(1886-1975)》上卷,第275页。

② 星火燎原编辑部编:《星火燎原丛书之五》,第147页。

③ 关于红二方面军,原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由任弼时、贺龙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1935年11月从湘西北的桑植出发,历尽艰险,在1936年7月初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中共中央指定红二、红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参见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159-160页。

④ 杨·海伦:《选择革命——长征中的红军女战士》,朱晋平等译,罗敏校译,第60页。

⑤ 顾秀莲主编:《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卷,第405、360页。

⑥ 参见星火燎原编辑部编:《星火燎原丛书之五》,第61、72页;杨·海伦:《选择革命——长征中的红军女战士》,朱晋平等译,罗敏校译,第35、60页。

⑦ 顾秀莲主编:《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卷,第405页。

⑧ 李安葆、刘录开编:《女红军长征记》,第5页。

⑨ 戴克宇主编,四川省妇女联合会编著:《巴蜀巾帼壮歌:红四方面军女战士革命斗争实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⑩ 杨·海伦:《选择革命——长征中的红军女战士》,朱晋平等译,罗敏校译,第31-32页。

⑪ 顾秀莲主编:《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卷,第360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后,我们每位女战士都发了枪,我除了背枪和子弹外还要背一个大药箱。”①这种行军的装扮正是妇女独立团女战士身兼多职的生动写照。

三支主力红军中的众多女战士构成了长征中的女红军群体,她们具有鲜明的共性。主要在于:她们大多年轻,绝大多数出身社会底层。据统计,红一方面军中完成长征的30多位女红军中有11人曾经是童养媳②,红四方面军中女兵大多是劳动妇女③。差异则体现在:红一方面军女战士经过严格筛选,多为具有工作经验的干部,集中于干部休养连承担政治任务;红四方面军女战士人数最多、来源最广,不仅有战斗编制的妇女独立团,还有大量从事宣传、医护、后勤工作的普通女兵,构成了长征中最为庞大的女性群体;红二方面军与红二十五军的女战士人数虽少,却以医护、机要、宣传等专业身份活跃于队伍之中。她们都是长征队伍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是这群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成长背景、不同岗位的女性,共同顶起了长征途中的“半边天”。

二、“巾帼敢顶半边天”

虽然参加长征的女红军人数不多,但是她们的肩膀上承担的政治任务,是长征行军中的重要一环,她们的职责主要包含战勤保障、宣传动员、参加战斗等。

(一)战勤保障

战勤保障是长征中女红军最主要的工作,主要是雇用民夫、分配担架、安置伤员等。另外,还有专门负责医护工作和运输工作的女红军。

红一方面军干部休养连中的女兵是政治战士,她们的主要任务是照顾伤病员,分派担架,做伤员和民夫工作。④ 董必武⑤强调:“初出发时差不多有六十副担架,途中一个人要管理三四副。这是异常艰苦的工作。”⑥她们的工作内容也称为“走前走后”。“走前”就是要提前了解部队明天的宿营地,早早出发,插在部队前面到达,雇用好民夫,为部队晚上的扎营作准备。⑦ “走后”是有时遇到民众都隐匿起来、雇不到民夫时,她们不得不费尽口舌宣传,劝他们为红军当民夫,而当她们拉着民夫回到宿营地时,部队已经出发了,她们又要去追赶部队。

由于雇用来的民夫对革命的认识程度是不一致的,时有打盹、开小差的现象,她们在行军途中也要不断地“走前走后”。同时,民夫们的力气不同,步伐也难以统一。这还需要女红军们时刻前后照顾着她们自己负责的担架,在民夫泄气时进行鼓励、劝说。甚至有的时候民夫实在是不肯走了,她们还要代民夫扛肩。

筹粮也是政治战士的重要工作。邓颖超回忆长征时曾特别强调:“长征中,除了作战以外,最大的困难是粮食问题。”⑧当时女红军筹粮的主要方式有打土豪、购买、赊借、就地采摘等。在行军途中打土豪还是很困难的,因为没有充分的时间调查研究,要速战速决。在这种情况下,打土豪最有办法的是红一方面军的李坚真。她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能够精准地确定哪家是土豪。她的方法是由远及近地查看地主家的情况,先到远处的山岗上观察哪个村子有高房大院,再听哪家的狗叫得最凶。然后再进村查看

---

① 李小江主编:《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第79页。

② 刘丽丽:《她们:三十二个女人的长征》,第91页。

③ 关于红四方面军中的女兵大多是劳动妇女,根据女红军苏凤描述主要是因为红军入川前,反动军阀和封建地主强迫农民种植罂粟,当地男子普遍吸毒,地里的农活主要靠妇女承担。广大妇女既受农活家务的重压,又受豪绅兵匪的凌辱,过着非人的生活,因此有着强烈的革命要求。参见星火燎原编辑部编:《星火燎原丛书之五》,第188页。

④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巾帼红军忆长征》上,第144页。

⑤ 长征开始不久后,连队中的30多位女同志单独编队,成立了妇女队。在周恩来等人的推举下,年近半百的董必武兼任了这支妇女队的队长,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胡子队长”。参见史真:《董必武长征中用担当与奉献写传奇》,《党史文汇》2016年第9期。

⑥ 《董必武选集》,第20页。

⑦ 郭晨:《巾帼列传——红一方面军三十位长征女红军生平事迹》,第7页。

⑧ 星火燎原编辑部编:《星火燎原丛书之五》,第143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三栏(猪栏、牛栏、马栏)、锅灶、农具以及屋内摆设、来往信件等等。作出判断后在地主家贴上字条,再向群众核实。这样群众看她们已经基本掌握情况也敢说实话了,经核实后,她们没收地主的浮财,开列清单说明是红军没收的,与群众无关,以免地主加害群众。李坚真说:"我们这套办法还真灵,往往一打一准。"①收缴地主的粮食、财物,一部分充当军粮,一部分分给贫苦百姓,既宣传了党的政策,又调动了当地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在自然环境更为艰苦、风土人情又十分陌生的民族地区,为了不激化民族矛盾,是不许打土豪的,筹粮工作就变得十分困难。对此,李坚真的回忆中有很多这样的描述:"藏民走了,几乎每个村庄都是空的,买不到粮食","我和廖似光两人去找粮食,找了半天,一粒粮也没找到","我们就只能采些野菜和豌豆苗煮点稀汤喝"等等。② 找不到粮食随地采摘能吃的食物就成了红军主要的生存方式,刘彩香、邓六金、廖似光主要负责这项工作,危秀英说:"初到少数民族地区,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我们就是靠吃野菜充饥。"③

除了红一方面军政治战士之外,红四方面军中的妇女工兵营为了保障部队在前线与国民党的四川军阀作战,王泽南率领第二连200多名女战士每人用一张被单将五六十斤粮食、一大捆棉纱或是四五支长枪绑在身上,执行运输任务。她们冒着枪林弹雨在川北的山区中攀登,有时几天吃不上一顿饱饭④;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二团一连的女兵们为了尽量多地完成抢救伤员的任务,两个人抬着用两根竹竿编制的简易担架,克服了从旺苍坝到永宁铺的险要地势,凭借着坚强的意志力,转移了50名伤员,她们被亲切的称为"抬子队"⑤;还有红二十五军的7名女护士,在长征途中冲上火线,抢救伤员,坚决执行严格的消毒制度,没有发生过一次医疗事故等等。⑥ 战勤任务的艰巨程度丝毫不亚于前线作战,女兵在从事筹粮、运输、医护等工作时避免不了要走很多冤路、远路、回头路,了解她们辛苦的红军战士赞誉她们是"走了三万五千里的人"⑦。

(二)宣传动员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⑧在长征途中,宣传动员工作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所有女战士都牢记在心,她们无论是否从事宣传工作,在行军途中都每时每刻、抓住一切机会向当地民众解释、宣传党的政策。基于女性的亲和力与感知力,女红军做宣传动员工作有天然优势。长征途中女红军所进行的宣传动员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面向群众进行宣传动员。发动群众、做好群众工作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与纲领。红军在长征途中,每到一处就要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政策,传播革命的火种,以便于扩充红军队伍。到达遵义时,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在遵义县城召开了群众大会,成立县革命委员会,在会上向群众说明了红军组织农民协会、保护工商业、做好群众工作的基本政策,呼吁群众参加红军。会后,李富春"派红军女战士李坚真等到学校组织'学生自治会'和'读书会',并组织宣传队到街头向群众演说,写标语,画宣传画。红军总政治部派人教学生们唱《决战在今朝》《送郎当红军》《红军真快乐》等革命歌曲,给少年儿童讲故事,组织儿童传递文件,站岗放哨。总政治部文艺宣传队还为遵义市民编演了活报剧《恶霸罗利甫》深受群众欢迎"⑨。原任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苏维埃中央政府教育部艺术局局长的李伯钊此时任总政治部宣传干事,在她的安排下,王泉媛、李坚真等文艺骨干多次在群众大会上饰演恶霸等角色动员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巾帼红军忆长征》上,第53-54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巾帼红军忆长征》上,第80页。
③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巾帼红军忆长征》上,第152页。
④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巾帼红军忆长征》下,第493-495页。
⑤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巾帼红军忆长征》下,第509-516页。
⑥ 星火燎原编辑部编:《星火燎原丛书之五》,第85页。
⑦ 郭晨:《巾帼列传——红一方面军三十位长征女红军生平事迹》,第8页。
⑧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150页。
⑨ 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59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群众。与王泉媛住在一起的康克清,对她的演技大加赞赏。鼓励她每到一处就演好恶霸、军阀如何压迫、剥削人民,揭露了敌人,人民就会拥护红军,王泉媛认识到演出的意义后,演得更积极了。

其二,在军队内进行宣传动员。面对长征行军途中的艰难困苦,有几位"歌舞明星",始终鼓励着战士们无畏艰险、勇敢前行。来自广东、福建、江西的女战士擅长唱山歌,红军中最有名的山歌手是李坚真、李桂英、王泉媛、邓六金,她们在行军途中自编了几百首山歌,正如李坚真编的一首"唱支山歌当点心",这些山歌是红军战士的"精神食粮"。李伯钊在贵州猴场举办同乐晚会鼓舞军队士气,晚会中她不光演唱了江西、福建和苏联民歌,还跳了海军舞。她创作的歌曲在红军中人人传唱,例如她创作的《打骑兵歌》《庆祝一、四方面军会合》等歌曲。"她走到(哪)里,(哪)里就活跃,就生动,就充满活力。"①在行军途中,蔡畅也经常唱起《马赛曲》,为战士们鼓舞士气,同志们听到她的歌声,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

其三,女红军的形象本身就是行走的宣言书。有学者认为:"她们的长征实践本身也是妇女解放的宣言书、宣传队与播种机,引领了中国女性的新觉醒。"②蔡畅回忆长征时提到:"中国的女红军和男同志一起爬雪山过草地,长驱二万五千里,这史无前例的壮举,引起了沿途群众的惊异和钦佩,并在世界各地引起强烈的反响。"③在当时环境下,中国妇女的地位极低,乡村社会的风气还是十分保守的。然而,沿途农妇、少数民族女性对女红军的态度都是十分热烈、友好的。在她们眼中,这些穿戴戎装,佩戴短枪,雄赳赳的女红军并不奇怪,反而更像是"花木兰"④。沿途妇女群众对女红军的态度足以证明她们对男女平权的渴望,而女红军恰好是中国共产党男女平权、劳动解放妇女政策的化身,她们的存在昭示着"男女都一样"上前线、参加工作的可能,代表着与束缚在家庭中的妇女完全不一样的新生活。可以说,她们对女红军的敬仰也是对新生活的向往。这种活生生、近在眼前的榜样无疑给中国妇女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在沿途妇女群众对女红军的热烈欢迎下,正如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政治处主任华全双所说:"我们的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⑤可见,获得解放的妇女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

(三)参与战斗

巾帼不让须眉,女红军中不仅有政治战士、"歌舞明星",也有运筹帷幄的军事家、赴汤蹈火的前线战士。红一方面军的康克清、红二方面军的李贞以及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等一众女战士,她们在战场上全副武装,与男同志一样行军作战。

尼姆·威尔斯(原名:海伦·福斯特·斯诺)是这样形容红军女战士康克清的:"她二十五岁时,已经靠自己的本领享有红军'女司令'的美名。"⑥1932年,康克清跟随女子义勇队接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在长征中跟随总司令部行动。长征路上中央机关担架队长生病,刘伯承命令康克清临时负责带领保护中央机关、军委高级领导(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都在其中)的中央担架队。一次行军过程中,中央担架队遭遇敌人埋伏,康克清当机立断,掩护好担架队,并组织特务排还击,同时派人通知附近的红军部队尽快击退敌人。在康克清指挥下,她们很快得到支援,担架队转危为安,特务排仅轻伤2人。⑦ 和康克清一样,红二方面军的李贞也很早就参加了游击队,一直跟随部队行军打仗。在长征前,得知组织上可能将她留下照顾怀孕的妹妹,她坚决不同意。于是,她马上找到时任中央代表、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坚决要求跟随部队行军打仗。

红四方面军的妇女独立团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她们在长征中多次与敌兵、土匪肉搏。据妇女独立

① 郭晨:《巾帼列传——红一方面军三十位长征女红军生平事迹》,第124页。
② 邵雍:《长征中的女红军》,《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③ 星火燎原编辑部编:《星火燎原丛书之五》,第124页。
④ 杨·海伦:《选择革命——长征中的红军女战士》,朱晋平等译,罗敏校译,第24页。
⑤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巾帼红军忆长征》下,第449页。
⑥ 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陶宜、徐复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74页。
⑦ 康克清:《康克清回忆录》,第78-80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团的岳克回忆:“女战士作战很勇敢,头发是剃光了的,穿草鞋、打绑腿,行军作战都看不出我们是女的。”①1935 年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开始长征时,渡江女战士剪掉长发,用乌泥涂脸,与敌人激战两天两夜;1936 年妇女独立团的女兵在腊子口遭遇一个营的敌兵和 100 多名藏族土司骑兵围堵,担任断后的 70 多名女兵全部壮烈牺牲②,岳克也在这次战斗中挨了三刺刀。③ 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参加的大小战役不计其数,多次受到总部的嘉奖。尽管由于历史原因,她们具体的人数、名单难以统计,但是她们付出的牺牲值得永远铭记。

另外,长征中的洗衣队、炊事班、粮食局、被服厂、军医院、修理所、加工厂等各个部门、岗位上均有女战士的身影。以中央队秘书长刘英为代表的妇女干部,她们在协助中央领导、维护中央机关正常运转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巾帼精神永流传

长征中的女红军,既具有红军战士坚定的革命意志,又展现出独特的巾帼精神,这种精神品格也是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

“革命理想高于天”,长征中的女红军既要面对茫茫雪山、草地,又要克服身体上的特殊困难,正是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支撑着她们不断前进。邓颖超在长征开始时即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当时这是几乎无法治愈的顽症。组织上曾考虑将她留在根据地养病,但她坚决要求随军行动,她凭借着顽强的革命意志始终没有掉队,随红军胜利到达陕北;蔡畅在翻越夹金山时,天气骤变,狂风夹着大雪,空气稀薄,她冻得直哆嗦,仍坚持鼓励大家“快跟上! 别停下!”并示意大家嚼生姜片驱寒。④ 邓六金面对敌人的轰炸,全然不顾未痊愈的身体,冲上去抬起担架,抢救伤员,自己却“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吐完血继续抬起担架追赶队伍。⑤ 杨厚珍拄着拐杖用“三寸金莲”走完了万里长征⑥;红四方面军的女红军在行军路上连一张卫生纸也找不到,因为冷、饿、累,她们大多数都得了妇女病。但是没有一个女同志叫苦怕死,她们对革命的胜利充满了信心。她们在革命意志的支撑下无视身体的苦难,心中最朴素也最坚定的念头,就是绝不能掉队——因为只有跟上了队伍,才能继续为理想而战。

(二)守望相助的战友情谊

“阶级姐妹团结紧”⑦,艰难的行军途中,女战士之间的相互陪伴、女干部对女兵的关爱使女红军之间结成了紧密的友谊和深厚的战友情谊。例如,红一方面军行至四川与贵州交界,邓六金由于疲劳过度,高热不退,又坚持不肯留下治疗,危秀英决定留下陪着她。在危秀英的精心护理下,邓六金的病情渐渐痊愈,两人一起赶上了大部队⑧;蹇先佛过草地时生产,老战友李伯钊悄悄给她留了两斤大米,自己却因缺粮而晕倒⑨;邓颖超、蔡畅等女干部像“大姐”一样呵护着年轻的女同志。邓颖超先后两次将担架让给因怀孕、生产而身体虚弱的廖似光⑩,蔡畅惦记着刘英赤脚行军,特意给她找了一双合适的皮鞋等等。⑪ 这种关爱、互助的美德正是长征中巾帼精神的集中体现。

---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巾帼红军忆长征》下,第 457 页。
② 顾秀莲主编:《20 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卷,第 360 页。
③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巾帼红军忆长征》下,第 457 页。
④ 苏平:《蔡畅传》,第 97 页。
⑤ 刘丽丽:《她们:三十二个女人的长征》,第 89-90 页。
⑥ 杨·海伦:《选择革命——长征中的红军女战士》,朱晋平等译,罗敏校译,第 177 页。
⑦ 星火燎原编辑部编:《星火燎原丛书之五》,第 124 页。
⑧ 陈福才:《从童养媳到顾问——记邓六金》,《福建党史月刊》1987 年第 3 期。
⑨ 杨·海伦:《选择革命——长征中的红军女战士》,朱晋平等译,罗敏校译,第 35 页。
⑩ 金凤:《邓颖超传》,第 195 页。
⑪ 星火燎原编辑部编:《星火燎原丛书之五》,第 122-123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三)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

参加长征的女红军平均年龄小,大多是十几岁的年轻女孩,她们正值青春年华,天性活泼。她们的开朗、乐观为单调的行军打仗增添了一抹亮色。行军途中,这些女战士也没有放弃对美的追求,廖似光在胶底鞋上绣花①、妇女独立团的女兵用五颜六色的绒球塞在枪口上防尘②等等,在行军队伍中透着青春活泼的气息。这种苦中作乐的方式还有她们在行军休息时由于过于饥饿而开的"牛皮公司",顾名思义,就是吹牛夸美食,蔡畅、康克清都曾参加过。还有过草地时因脚下打滑,走起来晃晃悠悠的,她们把这个称为"草地舞"。③ 这些精神食粮支撑着女红军,也感染着周围的人,显得生活还是那么美好。

(四)自我超越的成长意识

长征对女红军们而言,既意味着参加革命、追求理想,更意味着冲破束缚、实现个人成长。这种成长意识,正是在她们各自的成长背景中孕育而生的。她们有着不同的成长背景:有人来自比较富裕的家庭,如刘英、贺子珍、蔡畅等;而大多数则出身贫苦。尽管出身各异,但在旧中国,她们同样被剥夺了平等接受教育、自由选择婚姻与职业的权利,都无法实现真正的独立与成长。刘英曾说:"受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我爸爸只想让儿子上学,而不愿意让女儿上学。"④红四方面军的何曼秋则是为了逃避包办婚姻。而红军长征的实践给了她们真正的成长机会,有学者认为,"革命帮助她们远离了饥饿、肉体的折磨、卑微的地位、单调乏味的生活,以及婚姻的束缚"⑤。在长征中,无论她们是什么出身,都可以与男战士一样进行军事训练、学习政治知识、从事革命工作,这样的新生活帮助她们找到了归属感与远大目标。例如,何曼秋认识到红四方面军中缺乏治疗妇科病的医生,许多女战士又因为羞于找男医生诊断,经常耽误病情,于是下定决心从医。她在艰苦的行军环境中坚持学习,利用行军间隙向军医请教,在缺乏教材的情况下以伤病员为"课本"。她从"长征中的医护学校"毕业后,担任了卫生部门的领导。⑥

参加红军长征的两三千名女战士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是北上抗日、争取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与妇女解放的共同革命目标使她们从五湖四海走到了一起。正是上述精神品格的共同作用,使女红军在长征中实现了跨越式的个人成长。例如,危秀英幼年因家庭贫困被从兴国卖到瑞金,参加红军后,她从一名不识字的女工成长为能够独立开展群众工作的骨干⑦;李贞出身贫苦,6岁便做了童养媳,加入红军后,她在战斗中学习、在行军中成长,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位女将军。⑧ 虽然长征中女红军的最初身份不同,除了红一方面军中有部分中央领导同志的夫人及中央直属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女同志以外,大多数是饱受压迫与欺凌的劳动妇女。虽然长征结束后不同女红军有着不同的人生际遇(尤其是红四方面军部分女战士流落民间),但长征对所有女红军都是一次全方面的淬炼,艰难征程磨砺了她们的综合素养,使她们的能力得到全面提升。走出雪山草地之后,她们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

四、人生的跨越与成长

女红军们走出传统家庭参加长征是对妇女生理、心理的巨大考验。她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勇敢克服女性柔弱的生理特征,战胜了女性脆弱的心理特征,克服艰难险阻到达陕北,并实现了各自人生的

① 郭晨:《巾帼列传——红一方面军三十位长征女红军生平事迹》,第49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巾帼红军忆长征》下,第469页。
③ 郭晨:《巾帼列传——红一方面军三十位长征女红军生平事迹》,第54-55页。
④ 杨·海伦:《选择革命——长征中的红军女战士》,朱晋平等译,罗敏校译,第125页。
⑤ 杨·海伦:《选择革命——长征中的红军女战士》,朱晋平等译,罗敏校译,第135页。
⑥ 杨·海伦:《选择革命——长征中的红军女战士》,朱晋平等译,罗敏校译,第114-119页。
⑦ 星火燎原编辑部编:《星火燎原丛书之五》,第116页。
⑧ 杨·海伦:《选择革命——长征中的红军女战士》,朱晋平等译,罗敏校译,第85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跨越和成长。

(一)主体意识的觉醒与独立人格的塑造

长征打破了封建桎梏,使女红军在极端环境中确认了“革命女性”的主体身份。她们不再依附于家庭或男性,而是在承担与男性同样艰巨的军事任务中,发现了自身蕴含的潜能,确立了独立、自尊的人格底色。参军前的女红军,多处于社会最底层。她们中相当一部分曾是童养媳,或出身贫苦农家,在父权之下毫无尊严可言,这种极度受压迫的处境,使她们最初投身革命的动机朴素而直接——改变自身悲惨命运,挣脱家庭枷锁,追求人身自由与个性解放。正是这种与旧制度的决裂,开启了她们主体意识觉醒的第一步。长征途中,女红军与男红军一样承担着各项任务。女红军们被编入正式建制,从事宣传、救护、运输、筹粮乃至直接作战等各项工作。在实践中,她们发现自身蕴藏的远超想象的潜能——能行军打仗、能组织群众、能在绝境中求生。这种“我能行”的自我确认,彻底颠覆了旧社会对女性“弱者”的定位。她们不再是被保护的对象,而是部队不可或缺的战斗力量。这种“共同担当”的经历,进一步强化了她们的主体意识。经历了长征的生死考验,女红军们对自身价值的认知,已从“反抗压迫的女性”彻底转变为“肩负革命使命的战士”。这种在血与火中铸就的坚定信仰和自觉担当,构成了她们独立人格最坚实的基石。

(二)坚强意志的磨砺与心理韧性的建构

长征是人类极限的考验,女红军在缺粮、严寒、疾病及频繁战斗中,磨砺出超常的生存意志与心理韧性。这种在绝境中不放弃、在苦难中见信仰的特质,转化为日后应对任何复杂斗争的强大心理品质。在艰苦的长征途中,尽管女红军面临比男性更大的身体、生理、心理等方面的考验,有些甚至是对身体的极限考验,但女红军并没有被困难摧垮,她们抱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和革命必胜的信念,以乐观精神和顽强毅力,突破生理和身体局限,走完漫漫长征路,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奇迹。也正是在长征中的非凡经历,为女红军们提供了受用终生的心理资本。此后的革命岁月中,无论面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还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艰苦建设,她们都展现出超出一般人的抗压能力,也使她们能够坦然面对日后人生中的诸多艰难险阻。长征中锤炼出的这种“把吃苦当作家常便饭”的心理品质,成为她们此后人生道路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使其在任何岗位上都能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开拓进取。

(三)组织能力与专业技能的全面提升

长征为女红军们提供了一个历练各方面能力的实践平台,使她们在极端环境中完成了组织能力与专业技能的全方位提升,实现了从普通农村妇女或知识青年到复合型革命人才的蜕变。长征中,相当一部分女红军被赋予“政治战士”的特殊身份,主要任务是战勤保障、宣传动员与前线作战。这要求她们具备高超的组织协调与群众动员能力。在筹粮筹款过程中,她们需要与不同阶层、不同民族群众打交道,在极短时间内建立信任、完成物资征集。这种组织实践,使她们迅速成长为出色的“社会活动家”。长征也使女红军们掌握了多元专业技能。在军事方面,大批女战士接受正规军事训练,直接参加战斗;在医护方面,许多女红军承担救护任务,在缺乏药品条件下自制工具、就地取材;在宣传方面,长征期间的宣传工作,锻炼了女红军们将政治宣传与文艺表达相结合的能力,使她们在抗战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宣传工作中成为骨干。长征中锤炼的组织能力与专业技能,在女红军们后续生涯中持续发挥作用,为其在各条战线成为骨干力量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集体主义与革命大局观的树立

长征将女红军置于广泛的集体协作之中。行军途中,相互扶持成为常态。女战士们分工明确,有人负责抬担架,有人做宣传鼓动,有人负责护理伤员。这种高度组织化的集体生活,改变了她们此前孤立无援的个人处境,使其深刻认识到:只有在集体中,个体才能发挥最大力量;只有相互扶助,才能战胜共同的敌人。长征跨越十几个省份,途经多民族聚居区。这种“跨地域”实践,使女红军的视野从家庭、村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庄扩展到整个国家。长征途中,女红军还需要在“个人”与“集体”之间做出艰难取舍:割舍骨肉或被迫将年幼子女托付给当地群众。这种选择,并非对亲情的冷漠,而是革命大局观内化后的自觉担当。经历了这种“大我”对“小我”的超越,女红军对自身价值的认知发生了质变。她们不再只是为自己“找出路”的受苦人,而是肩负民族解放使命的革命者。这种集体主义和革命大局观的树立,也为其日后在各条战线成为自觉的革命建设者提供了坚实的精神内核。

总之,长征中的女红军以坚定的革命理想、顽强的生存意志与互助的集体精神,在排除生理期特殊困难的同时,承担了很多繁重的工作任务,突破了传统的性别界限,在革命实践中真正践行了男女平等。她们在生死相依中展现出的女性特有的温暖与坚韧,彰显了深刻的革命战友情谊。她们以强烈的自我超越意识,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学习、不断进步,在这场远征中完成了伟大的转变。红军长征史,不仅是一部军事转移史、军民鱼水情深史,也是一部女性成长史、巾帼力量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①在红军长征胜利 90 周年之际,女红军们所彰显的精神品格,依然激励着新时代女性将个人成长融入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在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实践中,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的新篇章。

The Long March of Growth: The Feminine Force during the Red Army's Long March

LIU Weifang[1,2], SUN Wen[2]

(1.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9, China;
2.School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Long March, thousands of female Red Army soldiers undertook multiple responsibilities, including logistical support, propaganda and mobilization, and frontline combat. In logistical support, they carried out arduous tasks such as transportation, medical care, and grain collection. In propaganda and mobilization, they leveraged their unique strengths to disseminate the Party's policies, win the trust of local populations along the route, and boost the morale of fellow troops. On the frontline, they fought bravely and showed no fear of sacrifice. The revolutionary will, comradely solidarity, and optimism they demonstrated enabled them to achieve transformative growth in several dimensions: subjective agency and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willpower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 and professional skills, as well as collectivism and overall strategic awareness. This growth not only constitute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the Long March spirit but also serves as a vivid illustration of the spiritual lineag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n the occasion of the 90th anniversary of the Long March's victory, the developmental journey of these female Red Army soldiers provides invaluable spiritual resources and exemplary strength for contemporary women seeking to integrate personal growth into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Long March; female Red Army soldiers; feminine force; Long March spirit

[责任编辑 陈 曦]

①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 184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